

废墟上的足迹

——徐光冀先生访谈录

◆ 徐光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沈丽华

◆ 郭 薛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光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组成员、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专家组成员、重庆市政府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等。安徽歙县人，1935年出生于北平市，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汉唐考古研究室学术秘书、副主任，所学术秘书组成员、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年鉴》主编等职。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全国首届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科学出版社两届优秀作者奖、《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荣誉证书等，还曾被评为重庆市政府“三峡工程先进个人”“北京市第六届书香中国·书香家庭（2016年）（10家之一）”。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参与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11月通过）》。主要研究领域为新石器至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曾主持或参加药王庙、夏家店、南山根、富河沟门、蜘蛛山、金龟山、大甸子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主持阴河-英金河流域、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等地段的调查发掘工作；主持郟城遗址和磁县北朝墓群的勘探发掘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参加制订三峡工程库区和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参加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东线文物

保护规划工作，同时参与评审和论证等。主要著作：参加《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编写；参加《魏晋南北朝文化》编写（学林出版社，2000年）；参与编写《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主编《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多部发掘报告，以及主编《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主编《永不逝落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北京燕



图一 徐光冀在三峡

山出版社,2008年)、《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三峡文物保护》(科学出版社,2018年)、《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献选编——回睥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发掘六十周年》(科学出版社,2020年)等丛书或文集;发表各类学术文章百余篇,集中收录于《废墟上的足迹——徐光冀考古与文物保护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图一)。

一、学术经历

沈丽华、郭薛:徐先生,您好!能有机会对您进行一次这样的访谈,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据我们所知,您的治学经历极为丰富,从史前考古、青铜文化到历史时期考古均有涉及。像您这样一位学术阅历极为丰富的学者,是如何走上考古这条道路的呢?

徐光冀:我们这一代出生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颠沛流离。自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市,1937年由北平到武汉,1938年到重庆,1939年到贵州桐梓县,在那开始上小学,1942年到湖北西部恩施、咸丰等地。继续上小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到武汉就读于湖北省立实验小学到毕业。1948年回到北平上中学。初、高中分别在北京崇德中学(今31中)、山东中学(今161中)毕业,1954年报考大学: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

1948年参加“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并给居民家中发送传单。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高中时任学生会主席,1952年北京市四届学代会当选为市学联执委会执委。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当时的学生会与后来不同,直接受党支部领导,与团委配合,不受校行政领导干预,有独立活动权利。1951年下半年,学校保送至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文学系学习,系主任老舍、班主任端木蕻良(萧红之夫),每周六晚上课,授课的均是著名作家和专家,在那认识了我的老伴。当时在《新民晚报》发表短文、小诗,也写过小说。中学时代还是比较活跃的。

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原因很简单,我的出身不好。你们现在可能不能理解,那时出身很重要,学考古不属于保密专业。当然我对考古本身也比较有兴趣,年轻的时候可以到处活动,做田野工作。1952年,裴文中先生参加赴朝鲜慰问团,来校做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全国只有北大设有考古专业,我的成绩也还好,那一年《光明日报》公布录取名单,北大历史系我考了第六名(学号5406006)。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分专业,当时历史系为四个专业: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考古。自愿报名,在分专业时,考古专业倍受重视,考古专业当时叫考古专门化(学苏联莫斯科大学),特请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



图二 1955年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长尹达、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做动员报告,在历史系有120多位同学,报考古班有25人,其中4位女同学(图二)。在北大读书期间,由于隶属历史系,除了学习考古方面的课程外,还要学习历史专业的全部基本课程,每周要上30多节课。刚入学时,校内考古专门化任课的只有向达、阎文儒和宿白三位先生。考古研究所苏秉琦任专业主任,宿白任副主任。校外的教师则有夏鼐、裴文中、贾兰坡、郭宝钧、唐兰、徐邦达、吴晗,还有埃及开罗大学爱米尔讲授埃及考古,考古技术课请考古研究所的老师讲授,地理系也有教师讲授课程。读书期间,先后参加了北京周口店遗址、洛阳的教学实习和陕西华县泉护村的生产实习。1959年大学毕业,分配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沈丽华:有些好奇,在您读书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您个人的兴趣方向是什么?

徐光冀:是战国秦汉考古。1956年,苏秉琦先生给我们讲授“秦汉考古学”对我影响颇大,当时学年论文,先生帮我选定的题目就是“东周青铜容器的分期”。1958年,在举国开展大跃进的大形势下,教研室请尹达(副所长)作报告,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于是考古专业师生提出编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编写组由教师和高年级(53级、54级)同学组成。《中国考古学》教材按时间段分成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战国秦汉、南北朝至宋元和资产阶级学术批判六个部分。在苏秉琦先生的指导下,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的“战国秦汉考古”部分,俞伟超负责战国至西汉部分,我负责东汉部分^①。奋战四十天,终于编成《中国考古学》打印教材,送到全校成果展览展出。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由党支部书记李志义组织几位同学,对李济、夏鼐、苏秉琦

写了三篇批判文章发表于《考古通讯》杂志。历史课的学年论文是1956年完成的,由汪钱指导,题目是《北魏均田制》,经汪先生审改。

郭薛:我们了解到在进入考古所工作之前,您曾经参加过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的布展工作,可以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徐光冀:那是在1959年初,我还没有从北大毕业。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新馆,筹备中国通史陈列,聘请苏秉琦先生担任秦汉魏晋南北朝组的组长,作为苏先生的助手,我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同时我班还有袁俊卿、邵望平、张万钟、黎家芳同学参加其他组工作。

当时通史陈列各大组组长,都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担任,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是贾兰坡,商周组郭宝钧,隋唐宋元组黄文弼。中国历史分期按郭沫若的意见。关于展览当时有很大争论,是以实物展示,图表为辅;还是以图为主?另外有些是政治问题,需请示,如西汉疆域隐去乐浪四郡,箭头划在鸭绿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赵铨、张孝光等几乎整体调来,做美工设计、绘图、照相,还有工艺美术学院师生等。令人高兴的是,我在泉护村南台地发掘了十几座仰韶文化的窑址,其中两座整体搬迁到北京,放在原始社会的陈列中。我们上班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址(即午门外东、西朝房),晚上也加班和学习,我当是住在故宫西华门内东房。这段时间晚上学习收集战国至秦汉资料,收获良多,有问题白天上班可请教苏先生和各位先生。当时有一件事,全国各地调来的文物,都有标签,保管部人员外行,多将标签弄丢了,发掘的文物变为传世品,做了一件蠢事。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8月初报到后仍在博物馆工作,我们有两位同学黎家芳、张万钟就分配到馆里工作。当年9月18日考古所要我出差到西安汉长安城工作,才匆匆到西安。此时离历史博物馆十月一日开馆已临近了。

沈丽华:我们知道您最初是在内蒙古赤峰一带开展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工作,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可以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徐光冀:我毕业后先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参加发掘工作,当时由黄展岳领队,分两组,一组在城外王莽九庙工地,一组在城内勘探未央宫遗址,我在城内工地任临时组长,勘探并发掘到未央宫陶排水管道。之后由于考古所边疆考古任务的需要,派到新组建的内蒙古工作队。1956年,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郑振铎主持制定《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6~1967)》。为研究边疆民族地区考古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课题,考古所计划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故此成立了内蒙古工作队,这也是考古所组建的第一支边疆工作队。于是1960年初就进入了新组建

的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任队长,我任学术秘书。这年春天,在内蒙古昭乌达盟试掘了赤峰药王庙、夏家店两处遗址,经初步资料整理,由我执笔的简报发表在《考古》1961年第2期,将当地的青铜文化区分为相当于殷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由于对比资料少,二里头文化刚发现,当时对两种文化年代推论方向是对的,但不精确。直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报告正式发表(《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对它们年代的认识才较准确。后来,又在巴林左旗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准喀尔旗纳林河流域等地区开展调查。年终回所总结汇报时,感到之前的战线太长,工作不容易深入,于是决定将工作重点集中到以赤峰为中心的地区(即辽西区),由于考古学是实证科学,难于辨别古代的遗迹、遗物属于何民族所有,首先只能从考古学文化入手,区别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序列。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和借助其他学科手段,才可能识别不同的民族文化,这是一项任务十分艰巨的学术课题,故只能先以摸清不同的文化面貌和年代序列为首要目标。

沈丽华:苏秉琦先生在《大甸子》序言中指出:1980年前后十多年间正是中国考古学科从它的初期基础研究(原始资料积累和理论建设)向较高层次研究(重建古史)的转折期……《大甸子》揭露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墓地(不下800座),居住址虽然揭露面积不大,但是对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这个考古学大系统中一个支系统的特定阶段而言,这样一处保存完好的典型聚落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对于重建古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在赤峰多年的工作中,您是如何先后区分出夏家店上层和下层文化,发现“富河文化”,并梳理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燕秦汉文化这一发展序列,建立起辽西地区文化的初步发展谱系?

徐光冀: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北方考古学研究起始于1921年安特生在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的发掘,比发掘河南浞池仰韶村遗址要早些。1923年4月,发表报告《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袁复礼译)^②。其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赤峰红山后遗址发掘,1938年出版的《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址》^③和前面提到的《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是当时这个区域最重要的两项田野考古报告。在《赤峰红山后》报告中,定名的“赤峰第二期文化”内容较为庞杂。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于“赤峰第二期文化”还没有科学的认识。1959年冬,刘观民等在赤峰附近调查(复查)了数十处遗址,初步感觉到所谓的“赤峰第二期文化”并不单纯。1960年春,我们在对药王庙和夏家店遗址进行考



图三 1961年7月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南山根遗址工地(前排右一赵信,后排右一冯孝堂,右二汪义亮,右三徐光冀)

古发掘时,发现夏家店遗址中陶片的复杂性,大体可分为两类,而药王庙遗址仅出土其中一类的陶片,这说明两类陶片很可能不属于同一时期。夏家店遗址情况比较复杂,发掘的4个地点堆积层次不尽相同。较上面的地层中包含两类陶片,一类是器表饰绳纹或篮纹而质地较为坚硬的灰陶器;另一类是表面光素无纹、质地较为疏松的夹砂红陶器。最下面的地层中,却只出质地坚硬、装饰绳纹或篮纹的灰陶陶片。在药王庙遗址发掘的4条探沟内虽均可分成若干堆积层,各层所出陶片也均为同类,如夹砂灰陶鬲、甗和泥质灰陶盆、钵、尊等,与夏家店最下地层出土陶片相一致。故此,我们肯定夏家店遗址的最下层应属于一种单纯的文化遗存,叠压其上的文化层当属另外一种文化。以夏家店遗址的地层为据,可知上层文化遗存应比下层文化遗存的年代要晚。至于两类陶片出自同层的现象,是原上层对下层扰动后混入造成的,或是发掘时将下层陶片混入上层。通过对这两个遗址的小规模试掘,科学地解决了“赤峰第二期文化”是年代有早、晚之别的两种文化遗存。1961年,内蒙工作队由我执笔在《考古》第2期发表的《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将这两种文化遗存分别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均属青铜时代。

继药王庙和夏家店两处遗址的发掘之后,1961年春,我们先在内蒙古宁城县发掘了南山根遗址(图三),再次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早晚关系,丰富了对这两种不同青铜文化内涵的认识。1962年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巴林左旗,先是在富河沟门遗址发掘了37座房址,发现有别于红山文化的陶器、细石器和大型石器,于是从过去的统称的“细石器文化”中区分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富河文化”。后来我们在南杨营子遗址的发掘中,也从地层叠压关系上证明了富河文化某阶段晚于红山文化。1963年下半年,发掘了赤峰蜘蛛山遗址,确认了红山文化、夏



图四 1983年夏于河北承德内蒙古考古队工作站(前排:苏秉琦,中排左一:郭大顺、左二:张忠培、左三:刘观民、右二:顾智界、右一:刘晋祥,后排左一:徐光冀、左二:卜工、左三:孔哲生)

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战国(燕、秦)至汉初时期的“四叠层”堆积关系,由此初步建立起了赤峰地区的文化序列和年代框架。1964年,我们在阴河、英金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首次确认了一批始建和使用年代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石城址群,并对新店石城址进行发掘。当时还设想将来选择一座大型石城址做大面积发掘,并对周围的石城址进行局部发掘并一一测图,可惜的是新店石城址的发掘还没结束,就被所领导电报召回参加“四清”运动。这次调查是普查性质的,发现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燕秦长城及沿线城障等遗址150多处。之后又历经“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干校”,内蒙队的考古工作暂停,直到1972年夏才逐步恢复。从1974年秋开始到1977年对敖汉旗大甸子遗址进行发掘,经初步整理后又于1983年进行补充发掘,局部发掘了大甸子城址220平方米,并揭示出墓葬804座。这是内蒙队建队以来规模最大的发掘工作,也是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做的整体发掘工作。我们在工作注重多学科协作,发掘和室内整理都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图四)。

沈丽华:从1983年开始,您从内蒙队调到河北临漳负责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从研究时段和方向而言,这个跨度比较大啊?

徐光冀:一生从事考古,都以工作需要为主。如在内蒙古地区工作正要取得重要成果之时,因工作需要,服从所领导的安排到了河北邺城工作,跨度是很大的。到邺城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考古所担任的工作比较多,比如担任过考古所的学术秘书、第三研究室学术秘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编委会秘书等,往返北京比较方便。另一个就是当年考古所进入邺城受阻,所里就动员我去,我直接找到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处长董增凯同志,谈成了,并确定学术上



图五 2005年7月于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整理邺城报告

以社科院考古所为主导。当时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这份合作协议书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对以后这类协议书有所借鉴。这样我就开始在邺城工作了(图五)。当时所里成立的是河北工作队,在邺城的工作是与省里合作的。

沈丽华:社科院考古所有比较长时间的都城考古传统,比如安阳殷墟队、西安丰镐队、汉长安城队、唐长安城队、洛阳汉魏城队等,当时考古所是基于什么样的学术考量,决定新设邺城考古队?邺城队也是第一个与地方合作共建的都城队吧?

徐光冀:上述五处都城遗址是1950年代初,由文化部遵照政务院颁布的考古发掘办法批准的,由考古所独家工作。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考古所又专门向国务院报告,这五处遗址仍由考古所独家工作,获得国务院批准。到了1980年代形势变化,河北省邺城遗址是独一无二的都城,与省里合作工作,是适宜的。上面提到双方的协议书,言明学术上由考古所主导。这是与省里合作第一例。邺城是汉唐之间的“六朝古都”,对于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史研究,十分重要。不过由于漳河泛滥,淤泥层厚、地下水位高,除地面调查外,省里仅做过小规模勘探发掘,十分艰难。直到1980年初,鉴于邺城遗址的重要性,考古所的领导决心开展工作。同时当时还有一个大的学术背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汉唐考古学研究中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日趋活跃,与之对应日本学术界对东亚古代都城的研究也呈现出活跃的局面。1978年,宿白先生发表论文指出,日本早期的都城如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等的共同性是模仿了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都城制度,而不应仅仅模仿了隋唐长安城^④。同年,日本学者岸俊男在复原藤原京时,也对日本早期都城模仿唐长安城之说提出异议,认为藤原京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时期的都城形制^⑤。1981年8~9月,以岸俊男为团长的第一次中国都城制研究学术友好访华团,对洛阳、西安等

地的都城遗址实地考察后,在考古所举行了座谈会,中、日学者就东亚都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另外,日本学者秋山日出雄在对日本早期都城藤原京进行复原研究时,则明确提出东魏北齐邺城与藤原京应当有前后承袭关系^⑥。于是,在这样的宏观国际学术形势下,为加强都城考古学研究布局,考古所决定在包括魏晋至北朝邺城、隋唐扬州城、南宋临安城等遗址开展工作,邺城考古队就是其中之一。除了邺城队以外,扬州唐城队和南宋临安城队也是相继与地方考古所合作的。

沈丽华:邺城考古队创立于1983年,那年您48岁,正是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学术积累和个人精力结合最佳的时候,刚到邺城开展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您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徐光冀:困难是肯定的,到邺城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重新学习,因为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的工作方法不同,需要重新琢磨怎么做。邺城作为都城历时较久,城市沿革复杂,又历经后代多次严重破坏,是个需要长期工作的大遗址。面对这样一座大面积的都城遗址,怎么下手?必须讲求田野工作方法,这样才能事半功倍。首先要阅读相关历史文献和过去的工作资料,然后是进行地面调查。邺城遗址地面上仅存金虎台基址和铜爵台遗址东南角,其余遗迹大多湮没在地下。早年北平研究院、俞伟超和地方的文物工作者们曾先后做过一些调查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在工作开展初期,我们采取勘探为主,局部探沟发掘为辅的方法,以求尽快把握宏观状况。

大遗址考古要讲求工作方法,宜先了解遗址的全貌,制定工作计划,而不宜一味进行大面积发掘。了解整体布局,又必须找到关键部位,比如说城墙、护城河、城门、街道、宫殿区等,这样就能搞清楚遗址的平面布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深入研究。邺城遗址总面积达100平方千米,我们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基本弄清了邺北城和邺南城的平面布局,到1995年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仅占城址总面积的万分之一。大规模发掘的仅邺南城的正南门——朱明门遗址一处,发掘约400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以来,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取得了系列阶段性成果。作为曹魏至北齐六朝古都,邺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占有辉煌地位,堪称中国城市建设的典范。通过我们多年的持续考古工作,确认了曹魏邺城单一宫城、中轴对称,功能分区规整有序的城市布局;到东魏北齐时期,邺城的平面布局更为规整,它继承了曹魏邺城创立的单一宫城制度,构建了由城墙、马面、城门和护城壕等组成的日臻成熟的防卫系统,具备科学合



图六 1989 年于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接待参观考察(从右至左:罗哲文、郑孝燮、徐光冀、朱岩石、杜仙洲)

理的道路网络和给排水系统。曹魏邺城、整齐而科学的城市格局,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洛阳城,东魏北齐都城(邺南城)是模写北魏洛京的全新都城,直接影响隋唐长安城的都城规划。这些对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等国的都城乃至后世的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市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沈丽华: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从一开始就提倡“大邺城遗址考古”的工作理念,这在当初应该算是比较先进的想法吧?

徐光冀:都城考古所要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城址本体,还需从广大地域的视角关注与城址紧密相依的陵墓区,以及分布于城址周围的手工业、宗教等相关遗迹。我们在邺城遗址开展工作的第三年,就对都城周边区域的陵墓群进行了寻找与调查(复查)。首先着手的是1986年磁县北朝墓群的考古调查,共调查确认了123座墓葬,并于次年开始针对该陵墓群中被破坏严重的M106号墓进行了抢救发掘(图六),后来发表的《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专刊就是关于这座墓葬的。湾漳北朝壁画墓是迄今为止在磁县北朝墓群发掘过的规模最大的墓葬,为了解茔地布局问题,我们除了发掘墓葬本体和坟丘,还勘探调查了神道、地面石刻、墓园建筑。墓葬地上部分也是古代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墓葬地下部分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同时对瓷窑址调查,对南北响堂山石窟进行考察,也是邺城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沈丽华:如果用时间来衡量的话,从1983年至1994年,您在邺城整整开展了十二年的城市考古工作,取得了极为瞩目的成就。对于城市考古,您有什么心得想和大家分享吗?

徐光冀:作为一个城市,包括都城,它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密切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中表现和反映。有些是政治中心,有些是经济或文化中心,有些是后来发展成为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对这类城址的考古研究是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这对考古学研究、历史学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我们国家除了都城以外,历代的城市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跟我们研究社会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初,西方有一些探险家、传教士,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科兹洛夫等都做过一些工作,如楼兰、黑城、辽上京等,但主要是调查和掠掘。真正开始做城址发掘是与安特生做仰韶遗址同一年(即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在河北巨鹿县宋代城址进行的发掘工作。安阳殷墟从1928年开始做工作,到现在有90多年的历史了,以后像城子崖等都是很早就开始考古发掘工作。

古代城市考古、城址考古,它的特点至少有四条:一是面积大。像汉长安城,光城内就有36平方千米。邺城包括它的城内和城外约100平方千米。二是文化层堆积厚、延续的年代长。汉长安城从秦代就开始,到两汉,到十六国,然后是西魏、北周,其他时期还有堆积。邺城作为都城是六个时期,即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六个王朝,堆积比较复杂。三是考古工作的时间长、周期长。安阳殷墟已经做了90多年,西安、洛阳的唐城和汉城都是50年、60年了,邺城起步晚,现在也快40年了。四是现代城市往往叠压在古代城市之上。西安、洛阳、南京、北京都是。

城市面积这么大,怎么做?首先要把它范围、布局搞清楚,包括城墙、城门、街道的网络,它的政治核心区、手工业区、商业区等。城市考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从工作方向来讲,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才不至于因为面积太大,掉进去就出不来了。不要轻易地大规模发掘,主要利用勘探的方法,或者开探沟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发掘面积不大,但是基本情况我们可以掌握。第二点要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要有一个好的地形图,万分之一、五千分之一、二万分之一的。目前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大部分地区都有,放大一倍即五千分之一,二千分之一地形图只好另测了。我们的工作长期性的,这张图就非常重要,有发现就要标到图上,并做好记录。我们只有在比较全面、长期地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做好保护,才能够发掘到比较关键部位,了解这个城市的布局功能,这是城市考古关键的问题。在城市考古当中,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方法,这个千万不能丢。现在自然科学的手段逐步增多,我们要收集资料信息,尽量运用这些方法。但是考古学的方法,还是最基本的方法。现在有人觉得落后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现在虽然说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参考,彼此可以补充,但很多问题仍然需要我们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解决。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方面就是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有的可能详细,有的可能少一点,我们要尽量地收集。同时,用现在的自然科学的一些手段收集资料,扩大信息量,这些对于解决城市考古的一些问题也非常重要。第三点做城市考古的时间长,可能要做几代人,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所以考古资料的保存和积累非常重要。不能领队换了,资料就带走了,下一位领队来,工作又要重新开始,那可不行。资料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几代人,不是一代人做,需要长期积累。城市考古到一定时间,要发表阶段成果报告,不能算总账。考古发掘是国家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在城市里要盖一座房子,盖房子之前我们要做勘探发掘,发现一些遗迹,当时看可能是孤立的,经过以后的工作,与其他遗迹联系起来,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所以资料的保存、资料的积累绝对不能中断。

城市考古是要花很大的力气,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反映在图上可能只是一条线,或者一个点。比如说在邳城钻探,围绕城址钻了三个圈,长度上百千米,一个是城墙,一个是城壕,一个是马面,花了一年多时间,很多人做勘探和记录,最后的成果写成文字可能就是几千字,但是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整个城址的范围,想急功近利是做不到的。总的来说,城市考古的深入开展要有全局意识,要“见缝插针、积少成多”,要在大的比例地图上统筹测绘、记录进行的工作,及时将考古发现的各类遗迹标示于其上,这样长期积累就会取得突破性认识。

郭薛:1978年,考古所恢复学术秘书组(后改为科研处)。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制订,《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开始编写。1983年初,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成立。以上您都曾担任秘书,协助夏鼐先生工作,应该受到先生很多影响吧?

徐光冀:是的。我与夏鼐先生相识,是1954年秋,当时夏先生在北大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课”,听课的是历史系53级、54级全体同学,还有考古所、市里一些单位同仁,我是该课课代表,与先生接触多一些。当时负责记录的是吉林大学进修教师单庆麟。他非常认真,下课找许多人对笔记,出了一本内部铅印“通论”,使我们了解当时中国和世界考古的情况。考古所各田野队、工作队都由学术秘书组管理,只有内蒙古工作队,王伯洪说他不,直接由夏所长管,这样刘观民和我与夏先生接触多了,他的温州话就听得懂了。夏鼐先生主持考古所工作长达30多年,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很大。他一贯重视和严格要求田野考古工作,制订严格的规章制度并督促执行,考古研究所从1950年代建所就制定了本所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文化部1984年发布要求统一执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就是这个规程基础上形成的。先生1952年发表的《田野考古序论》和1956年发表的《田野考古方法》是田野考古工作的经典之论。要贯彻执行,需要有制度保证。考古所新入所培训、田野队每年的学术目标、工作计划、工作期间的每月简报(汇报)、考古工地每年的年终汇报,先生都亲自主持过问、批阅指示,对工作进行总结和点评,布置第二年的田野工作和学术任务。另外,先生非常强调认真严谨的学风。1961年秋,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到西安检查沣西遗址工地,当时夏先生要看实测图,领队拿不出来,队内其他同志拿出一张皱折的图,夏先生又问领队开方的位置,为何这样开方,领队答不出来,实际上虽住工地,但很少到考古现场。先生回所后,作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另外,大家都知道夏先生常以“瓜田李下”譬喻“考古人不许收藏文物”,这是写入了“考古人员守则”的,是新入所人员要上的第一课。

二、学术成就

沈丽华、郭薛:从您的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您的学术成果极为丰硕,其中既有像《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这样的大型集体著作,也有《大甸子》、《湾漳北朝壁画墓》等重量级发掘报告,还有《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类大型丛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您的个人文集《废墟上的足迹》,这些一定与您丰富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我们看到您在《辽西区古文化(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综论》一文中谈到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论”,2019年是苏秉琦先生诞辰110周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了“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您参会并第一个做了“区系理论开拓了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的发言,可以谈谈苏秉琦先生对您的影响吗?

徐光冀:苏秉琦先生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是新中国考古学的指导者之一,是中国大学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始人。和先生接触,从大学时期就开始了。当时先生是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主持教学和学生培养工作。1956年,先生给我们讲授“秦汉考古学”,这时接触开始多起来。先生讲课的特点是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外,还特别着重讲授研究方法。根据教学计划,这一年要做学年论文,先生帮我选定的题目是“东周青铜容器的分期”。先生耐心教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做卡片、如何进行分析排队等。后来由于教学计划的改变而中辍了,而这些卡片,我至今还珍贵地保存着。1957年我们班在洛阳进行田野教学实习,前段由陈公柔先生指导我们发掘纺织厂的战国墓,后段由苏秉琦先生指导我们整理涧河两岸的发掘资料。每两人一组整理一条探沟,写出实

习报告。先生一组一组地进行具体指导,对我们进行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基本训练。1958年在陕西华县泉护村进行田野生产实习,这是一次从发掘到整理的系统训练,苏秉琦先生在发掘后期到工地指导实习工作。我当时负责发掘的探方发现了龙山文化遗迹和一批仰韶文化时期的窑址,先生根据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对探方出土的仰韶文化的陶片进行了仔细的分类排比,分析了小口尖底瓶、彩陶盆等的具体特征,并对它们进行分期,使我从中受到深刻教益。

区系论,古文化、古城、古国论以及古国一方国—帝国论等学术思想,是苏秉琦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⑦。这些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说之所以能够相继被提出,当然同苏先生长期以来对全国各地考古资料分析之详和探索之深是分不开的。而这里面有一点十分重要,我们20世纪60年代初在辽西地区开展工作,区分出夏家店下层和上层两种青铜时代文化,在红山文化之外又发现富河文化,这些重要信息吸引了先生的注意力。如果仔细回顾先生的研究,就可以发现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每每成为先生首选的重点研究对象。区系类型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但其萌生却是20世纪60年代甚至50年代。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则是以辽宁西部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发现为背景。随后揭露的止锚湾——金山嘴秦汉建筑群,使得先生不断思考,特别是联系到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群分布的特殊性,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古国一方国—帝国的文明进程三段说。作为内蒙古队的成员和时常聆听先生教诲的学生,我们一直在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是根据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实践提出来的,进而又指导考古学科的实践,在实践中上升到理论,再指导学科实践。目前来看,要充实丰富先生提出的辽西地区历史发展的框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如理清古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时空缺环等等,这些都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区系类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包括中国史前史的重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和苏先生一起工作还有在他领导下,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1959年为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北京建设了十大建筑,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新馆即其中之一,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要布置“中国通史陈列”,当时从全国调集了500人参加,同时调集全国文物。建馆领导小组由邓拓担纲,1959年初,我和同班四位同学,也参加了通史陈列。我参加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组,大组长苏秉琦、顾问商承祚,组员中还有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朱大珣、孙达人、祝又华等,我们主要负责内容设计,包括陈列内容和说明,另外还有一套美工陈列设计人员。向先生学习考古文物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和文化。

还有一段时间与苏先生相处较多,是在到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部到五七干校是1970年5月至1972年7月,干校时期我们是与近代史所组成一个连队。去了之后种地、自己烧砖造房,我的工作打砖坯烧砖。先暂住老乡家,当年冬即搬至自己盖的新居。夏鼐、苏秉琦先生看白薯地和煮白薯喂猪,近代所也有老先生如刘大年,后来开玩笑的互称“同学”,五七干校的同学。那时十天一休息,休息时随夏、苏两位先生考古调查。当年冬季住新房后即开始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由军宣队领导,1971年春,即迁往明港在军营继续清查,我当时是重点对象之一。夏鼐先生提前回北京。1971年夏,又一批同仁回北京准备《考古》、《考古学报》复刊,筹备出国文物展。当时,休息日还是同苏先生一同考古调查,“9.13”以后,运动停顿。休息日与苏先生一起调查的人,日益增多,有历史所、民族所一些同仁,开始做探沟,我指导发掘。这期间先生与我谈的较多,如中国文化起源,不是从一个地方发生,而是多地发展,逐步经长期交流融合,特别和我讲我在辽西地区工作很重要,就是要做区域考古,并说准备写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实际区系思想已形成。总之,几十年来,与先生在一起的岁月,获益终生。

沈丽华:苏秉琦和严文明两位先生都曾对您参与编写的《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予以高度评价,您可以简单谈谈这部报告吗?

徐光冀:《大甸子》是“七五”(1986~199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考古学重点项目,1986年被批准立项,1987年就完成了。主编是刘观民,参与编写的有刘晋祥、郭大顺、邵国田和我,我主要负责居住遗址部分的编写工作。这部报告请苏秉琦先生做了序,报告中公布的主要是内蒙古工作队1974、1976、1977和1983年补充发掘在赤峰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发掘工作,遗址方面确认了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址,这座城址的规模约7万平方米,是附近多座城址中规模最大的,应该是一处中心聚落。在城址旁边有规模较大的墓地,一共发现804座,我们全部进行了发掘。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圹墓,葬式以侧身直肢为主,有大、中、小三型墓葬,大型墓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这里大型墓和中小型墓的区别是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现象。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比较丰富,陶容器中鬲和罐是最普遍的随葬器类。因为鬲的特征比较显著,我们区分出不同的用鬲集团,这个遗址既有防御设施又有大型墓地,而且在遗址周围25千米范围内,我们经过多年调查,发现多座类似城址,都没有大甸子遗址这样规模的。这个遗址的墓地明显分三大区,各大区中又可以分成若干小区,可分为A型、B型、C型三型用鬲集团,再配以其他随葬品,符合周礼

“族坟墓”的记载。A型用鬲集团是最强势的,A型鬲墓葬中大型墓也只占少数,有多套彩绘陶器,与二里头文化相类的鬲、爵随葬在一起共13座墓葬。不同等级墓葬,葬于同一墓地,应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聚落墓地,其中有不同氏族、不同家族。因此,我们提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遗址,其社会应是已进入文明和国家的发展阶段。这部报告后来获得了首届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联系到我们在赤峰阴河、英金沙石城址的调查,43座石城址中,分为几个组群,而且在辽西地区我们调查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在5000处以上,且与二里头文化年代相当,这些都是中国文明起源多元的例证。

沈丽华:您还主编过《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这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关南北朝时期帝陵的发掘报告,也是历史时期为数不多的帝陵报告之一,北大的沈睿文和韦正两位老师都曾写过书评。尽管这部报告出版已快20年,但是报告中对陶俑的描述、对壁画内容的分析这些基础工作都已成为学界的标准术语,为大家广泛采用,您可以再谈谈这部报告吗?

徐光冀:前面已经说过,湾漳壁画墓非常重要,这座墓从墓葬构造到出土遗物都具有一定特殊性,墓中出土了大量陶俑及其他遗物,还发现了精美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但是因为被盗和自然损害等原因,发掘时工作的开展极为艰难,这批资料也显得有些杂乱无序。如何清晰、全面、准确地发表这批资料,是邺城队当时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花了近10年的时间进行文物保护和报告整理编写工作。在报告编写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坚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并恪守以实物说话的基本原则,以全面、准确地报告客观现象为己任,将相关认识和推论限定在与报告发生直接关系的范畴内。如对壁画的仪仗队列,两壁各53人,其手持仪仗,难于与文献记载吻合,我们用考古学的方法,将其分为22类公布出来,提供给学者和读者研究解读。虽然经过资料分析研究,湾漳壁画墓的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但是我们在报告的命名和结语推论中,仍然坚持客观报道与主观推测严格分开原则,既没有以“北齐文宣帝高洋武宁陵发掘报告”名之,也没有将倾向性推论强加给读者。后来,我在《“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见,考古发掘简报、报告发表资料需慎重、客观。另外,我们在这部报告和前面说的《大甸子》中不仅力争全面公布资料和结论,还注意将田野工作和整理研究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详细加以叙述,说明资料是怎样取得的,通过具体分析得出了哪些结论,还有哪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以便于学者们在研究这批资料时可以有所取舍。

郭薛:我们注意到由您主持的发掘报告《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和个人文集《废墟上的足迹》都请宿白先生题写了书名,您和宿先生的感情一定非常深厚吧?

徐光冀:宿白先生是我的老师,1954年我们入学的时候,苏秉琦先生是考古教研室主任,宿白先生是副主任,因为苏先生是从考古所过来兼职,每周五天,周六回所。日常的工作主要由宿白先生负责。宿白先生给我们讲授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作为学生终身受益。每有文章都请他审阅,他总是认真审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1983年我开始负责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曹魏邺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的重要地位最先就是由先生提出的^⑧,他也颇为强调东魏北齐邺城和陵墓对隋唐长安城和唐陵制度形成的直接影响^⑨。宿白先生为人正派,亲切近人。记得有一次北大考古学系邀我做专题讲座,我先去看望先生,一同晚饭后,他与我步行到教室并主持讲座,尽管当时他已经卸任系主任。2010年,“曹操高陵”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议,由于涉及行政干预,一些学者不愿表态,而他却本着学者的责任感仗义执言,始终支持我的观点,认为安阳市西高穴2号墓由于证据不足,不能确认为“曹操高陵”。他这种严谨的学风一直深刻感染着我(图7)。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宿白先生当选为常务理事,我在学会秘书处工作。之后他当选为副理事长时,我当选为秘书长;苏先生逝世后,先生主持学会工作,再以后先生被确认为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之后又任名誉理事长,相处时间很多。1980年代以来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专家会议,评田野工作奖、考察重要考古工地,参加全国性考古工作会议、评选考古十大新发现等,都与先生在一起。每年我们几位老学生都给先生、师母过生日。每年几次到家看望先生,当面请教,获益良多,师生情谊日笃。

沈丽华: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向以壁画著称,我们知道出土壁画在中国考古学史和美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9,宿白先生就曾主编过《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墓室壁画墓》,后来罗世平和金维诺两位先生曾先后主持出版过《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2010)和《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墓室壁画全集》(2011),不过所辑墓葬与当下出土壁画资料仍不相称。由您主编的《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改变了这一状况,这应该是您主持过的最大部头的一部丛书吧?我们知道“中国出土文物大系”是科学出版社倾力打造的一个品牌,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玉器、瓷器,壁画这个系列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徐光冀:《出土壁画全集》除收集墓葬壁画,也收



图七 1985年3月于北京大学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前排:苏秉琦、宿白)

集遗址出土的壁画。这个书系总的编辑方法是以省市区为单位,编辑成册,全书在第一册设前言、出土壁画分布示意图、出土壁画分布地点及时代一览表。每册各有概述、凡例,图片按时代排序,同一时代内,将有明确纪年的排列在前。每幅壁画均注明名称、年代、出土年份、尺寸、出土地点、以及方向和位置,保存状况和存放地点,并作简要文字说明,以方便读者查阅。和玉器、瓷器两个全集略有不同的是,我们除了每册省、市、自治区的概述外,还在第一卷增加了前言、分布地图、分布地点来说明出土壁画的整体状况。这部书编撰不容易,最开始我自认不是合适的人选,但在闫向东社长的多次动员下,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当时还邀请了汤池、信立祥、朱岩石、秦大树一起进行这部书的编辑工作。这部书从开始启动,到正式出版,前后花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这部书编纂的基本目的是学术性、资料性、艺术性、知识性,也就是雅俗共赏。这是一项团队的工作,除各省市区有分支编委会,参加工作的人员有200多位。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老师宿白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墓室壁画》时,出土壁画材料并不是很多。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出土壁画增加了不少新的资料。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国发掘出土壁画有577处,这部书选入了364处,占全部壁画的五分之三,没有收入要么是被毁了,要么就是漫漶不清的,当然为了弥补遗憾也酌情收入了少量摹本。这部书除出版中英文对照版,还单独在东京出版日文版,出版后的评价还不错,曾经获得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3年),这是集体的荣誉。

三、保护与规划

沈丽华:从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到21世纪初,国内很多考古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曾经参与过三峡工程文物保护抢救性发掘工作,听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工



图八 2015年3月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终验专家组合影(从左至右:乔梁、王川平、陈振裕、徐光冀、傅清远、吴宏堂、刘豫川)

程,也是第一次先规划、后实施的文物保护工程。您作为规划组和专家顾问组成员,从1992年开始工作,1994年开始参与规划编制,到2014~2016年作为文物保护终验专家组组长参加国务院对三峡工程的终验,方便简单谈下当时的工作背景吗(图八)?

徐光冀:三峡地区西起重庆、东至宜昌,长江南北两岸分别有很多支流汇入,和周边的山地形成一个独特的峡谷地貌,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巴人的重要活动区域,秦汉以后虽然被纳入中原汉文化的大格局之下,但是因其地理单元的独立性,仍保存了地方文化特色,同时因为地处沟通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的咽喉地带,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使得三峡地区成为考察中国古代尤其是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一面独特镜子。但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开展之前,我们对于这一地区了解却远不够全面和深入。虽然三峡的考古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了,1949年后三峡水库建设的动议正式提了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文物方面实际上一直在做相关的准备工作,包括各种重点地段的调查和发掘等。但总的来说,在三峡工程最终决策之前,这种准备工作一直都不是很系统的。

1992年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正式通过之后,作为三峡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也正式拉开序幕。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三峡工程的水库总面积1084平方千米,受淹面积达到632平方千米,涉及湖北和四川(重庆)两省22个县区,在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大规模基建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最大能力抢救与保护这一区域(三峡工程库区淹没区和迁建区)的文化遗产。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系统的规划与顶层设计非常重要,所以整个三峡文保工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3~1996年的规划阶段,和1997年(湖北库区是1995年)~2009年的实施阶段。

最初国家文物局组织文物保护和考古专家,分地下文物、地面文物两个组,对重庆至宜昌段三峡工程

库区文物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随后国家文物局就成立了“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1994年初,由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和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按国家文物局要求,负责编制《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抢救保护规划》,为此组建了“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由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担任组长,时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黄克忠任副组长,傅连兴和我分别以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和考古专家组成员参加四人组成规划组。同时聘请贾兰坡、侯仁之、吴良镛先生为顾问。规划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相关规划、资料档案工作,办公室成员除两单位人员外,还借调了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德市文物局的同仁。

规划组与来自全国30所大学、科研机构签订合同,有300多位专业人员参加了制订规划的基础工作,对淹没区和迁建区的地下文物和地面文物进行大规模调查、勘测和发掘,基本摸清了文物点的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为后来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地开展奠定了基础。从1994年至1996年3月,规划组完成《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这是我国大型基本建设中编制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文物保护规划。规划分为总规划、分省规划、分县规划和专项规划,共计30本200万字,涉及文物保护项目1282处。经专家论证修改补充后,并报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批准,最终确立了1087项保护项目,包括地下文物723项,主要是一些重要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地面文物364项,主要针对古建筑、石刻(含水下)、栈道、纤道、桥梁等地上文物,包括原地保护、搬迁保护、以及留取资料三种类型。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同时根据库区文物的价值和保存状况,拟定了不同的保护措施。后面的实施阶段基本就是按照这个规划开展,来自全国近百家单位的上千名专业人员和上万名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三峡的文物保护大战,你们参加的应该就是实施阶段高校考古院系和科研机构配合参加的抢救性发掘。

郭薛:是的,我稍微晚一些,没有赶上三峡的考古工作,后来连续两次实习都在南水北调的工地上,不过现在从事的是文物保护和利用方面的工作。说到这里,您觉得三峡的文物保护工程作为我国第一次大型的文物保护工程,对南水北调以及后来类似的大型文保工程有哪些启发,或者值得借鉴之处?放在今天来看,您觉得当年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有哪些缺憾?造成这些缺憾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这些缺憾或者问题放在今天有可能得以解决吗?

徐光冀:三峡的文保工作至少三个方面可为后来的大型文物保护工程提供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是工作的系统性。前面提到了,在工程开展之

初,按照三峡建设委员会的要求,就成立了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规划组,先做各级行政区的规划,包括分区县规划、分省规划,再做总规划,共计约200万字,后来我们国家很多大型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比如大运河、丝绸之路,基本也是按这个思路编制的保护管理规划。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专项规划作为附件,比如博物馆建设等。有四个大的项目也做了专项规划:白鹤梁、石宝寨、张飞庙和屈原祠,经费是单列开支。今天我们看到的水下博物馆里的白鹤梁石刻就是这一时期保护的成果。这个对于大型文保工程,尤其是基建中的工程项目,不仅停留在提取与保护层面本身,同时也考虑到了后续的展示与传承,当时规划建设的三峡库区博物馆,包括重庆的主馆,不仅是西南地区馆藏最为丰富、展示最为系统的综合博物馆之一,也都成为今天深受大众欢迎的文博场所,成为人们了解这一地区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窗口,这也是我们为后人做的最大贡献吧。当时重庆三峡博物馆,申请的是中国三峡博物馆,国务院批复为“重庆市中国三峡博物馆”仍定为地方博物馆。现在三峡各区县,都利用三峡文物建设了区县博物馆,三峡文物得到充分利用。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1992年夏,在北京芳园宾馆召开有国家文物局领导参加的考古专家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讨论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会上意见,与黄河三门峡水库文物保护一样,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后来局里考虑到当时考古所的状况,作罢。

二是视角的前瞻性。保护工作没有把视野局限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文物范畴,同时也考虑到了很多其他方面,比如刚才提到的民族、民俗文物,三峡工程淹没区是土家族聚居区,他们在这里世代生存繁衍,创造了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是长江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保护工程启动之初,就委托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教授做这方面的专项工作,从生产工具、衣服装饰、居所家具与宗教信仰等十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且提出了影视影像记录与保存、典型文物征集与保护、古代人骨搜集与DNA分析等保护措施。除此以外,还特别关注了沿江的栈道和纤道,由于江水湍急,特别是洪水季节航行中断,在两岸绝壁古代人民开凿栈道,以便通行,如大宁河栈道、偷水孔栈道等,纤道是专门为纤夫逆水牵引船只开辟的通道,它们都是古代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记录,因此也都采取了原地保护和留取资料的方法——有些进行了复建、翻模复制或切割搬迁。除水路交通外,陆地交通多靠桥梁沟通,三峡地区古代桥梁颇有特色,也都分别采取了整体搬迁和原地保护的措施。

三是制度的先进性。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按单位、按领队来分配遗址进行工作,从发掘到报告编写

负责到底,不能几个单位同时做一个遗址,这是很重要的经验。这个方法过去叫队长负责制,现在叫项目负责人制度,必须有领队、单位负责,不能像以前在湖北纪南城大会战时,几个单位负责一个殿址,结果谁也写不出报告,造成严重损失。工作采取合同制的办法,开始之前要签合同确定工作内容和经费,同时要有第三方监理验收。三峡是整体验收,到南水北调工程时一个遗址的工作做完了就验收,一个接一个的验收。然后是各省市终验。目前南水北调工程还在试运行,尚未经过国务院终验。

南水北调工程基本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在规划起步阶段,由水利部成立南水北调前期工作专家组,负责指导各省市规划工作的开展,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工作。中线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汇总,东线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汇总,并对规划报告(可研报告)进行调研、论证、审核。与三峡工程相同的是丹江口水库抬升水坝,库区扩容,有部分淹没区和移民区;不同的是有跨越数省的渠线,虽然也具有规模大、时间紧、范围广的特点,但输水干渠是在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或者至少是同步开始规划设计的。所以前期选线阶段的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各省市在进行细致的调研、勘探后,需首先写出基础资料报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历史资料、环境资料、渠线途经地区文物分布状况。然后进行论证,再进行南水北调渠线的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渠线通过的地区把握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地面古建筑等文物尽量避开,地下文物有选择的避开。其次,有了三峡的经验,在南水北调中考虑到地下文物的不可预见性,在规划中提高了不可预见经费,即从三峡工程的1%提高到4%,同时提高了基本预备费。东线工程渠线主要利用大运河输水。此外,监理、验收制度更完善。在南水北调项目中,改变以往项目承担方互相检查、验收的局面,而改由第三方进行项目监理工作,项目结束后由省文物局和调水局安排专家组进行项目验收工作(图九)。



图九 2005年夏参加河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调度会(中:张柏、右二:徐光冀)

略显遗憾或者不足的地方,比如说《规划》审批滞后,1996年3月上报,直到1998年9月才召开专家论证会,2000年6月全部项目方审批结束。地下文物有不可预见性,不能完全按照工程施工的管理办法,有的地下文物中心地带移民工作滞后,未能给文物保护工作留下充足的时间;有的民居搬迁复建,因为时间紧迫,整体环境的协调性不够;再就是前面提到的《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专题规划,审批时全部被删除了,这是非常可惜的缺憾。这些遗憾有些是受限于当时的工作背景和工作经费等客观因素,另外一些也与当时整体的文物保护理念有很大关系,如果放到今天,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峡已经做得很好了。

郭薛: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三峡的文物保护对于今天习总书记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以及黄河文化传承弘扬也提供了重要借鉴?

徐光冀:是的,不仅仅是长江,虽然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个大型的抢救性保护工程,但其中的某些理念和做法对于今天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也是很有借鉴和启发的,比如说交通遗产的保护、民俗文物的调查与保护、革命文物的保护等。前段时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黄河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其中就有一项“水陆交通”,把与黄河相关的渡口、古道、路桥等代表性遗存提了出来。这一点很好,如果放到世界遗产的语境下来考察,有些交通遗产可以视作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人与自然,与江河互相作用形成的遗产。民俗文物在其中没有专门提及,但我相信应该会在未来其他的规划或者文件中包括进来,毕竟黄河所影响和塑造的信仰、习俗更加深远,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所作的民族民俗文物,不仅仅限于常规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更是一种遗产地精神的鲜活见证。

郭薛:是的,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管是理念、技术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您也又陆续指导了很多大遗址保护工作,比如高句丽遗址、扬州城遗址、鸿山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您觉得这些大遗址保护工作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值得肯定和反思之处?

徐光冀:我印象比较深的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几处大遗址,一来因为它们各方面工作开展都比较早,二来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也比较扎实,比如说高句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把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王陵和墓葬区都囊括了进来,对遗址本体和环境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展示手段也很丰富,公众反响

很不错。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城址进行了完整保护,遗迹主要是模拟展示,开放展示做得也不错,希望未来能有更好的社会效益;三星堆新的遗址博物馆,隐于地下,“有似无”而展示内容又极为丰富,吸引了众多观众,社会效益好,经注效益也好。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了更好地保护遗址,将保护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了整体搬迁,种植调整为农业生态展示,目前主要在博物馆内进行展示。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成都市区,保护难度很大,当地政府调整建设规划,置换回购土地,对遗址实施整体保护,公园内除了遗址的原状展示外,也有遗址博物馆对出土文物进行展陈,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备受市民欢迎,金沙也早就成为成都的城市名片。

总的来说,虽然这些大遗址的年代、性质、规模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保护方面我认为有几点共通之处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是有个全面、长期的保护规划,是保护工作的基础。有很多大遗址,都是通过规划先行,实现了对遗址本体和环境的整体保护。规划可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要着眼于现实问题,也要放眼于长远发展。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工作的开展,规划的内容可能需要有所调整。比如扬州城在做遗址公园规划时,对原《扬州城遗址(隋至宋)保护规划》中认定的蜀岗保护范围也提出了修正方案,其他遗址公园规划也是一样,都是有时段性的,随着考古工作进一步开展,有了新的发现,还需要再做修正方案,又如邳城遗址的保护规划,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其保护范围也需要修正扩大。

二是考古工作的长期、持续开展。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是大遗址保护的基础,有些时候我们的保护与展示工作要为后面的考古工作预留空间,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坚持持续性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加强室内整理和相关的学术研究,是遗址生命力的保证。我前面提到的这几处大遗址,基本上都有长期的考古工作计划,近年来也都有不少很好的新发现,给保护工作增加了新的挑战,也给展示和开放带来了许多新的内容。

三是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这本身也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初衷,我提到的这几处遗址公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这当然是最好的,但也不必勉强。考古遗址公园在保护展示的同时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有一个休闲和参观的地方。所以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建设遗址公园,比如在城乡交通方便的地方建遗址公园比较容易,但要是深山林子里面搞遗址公园,就没人去了。各地结合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不要机械模仿,只要坚持在抓牢保护文物的前提下,灵活运用。

最后,保护单位和管理体制也非常重要,《文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做为企业资产经营。这几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都还是文物部门自身在管理,日常运营也不错。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本应由文物部门管理的文保单位,却交由旅游部门管理,造成文物的损害。这两者之间未来需要一个更好的机制来解决。

沈丽华:说起保护我也很有同感,比如在邳城,我们发现的基本都是土遗址,埋在地下,地面几乎无迹可寻。发掘结束后,从公众的角度当然原状展示最好,但是在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遗迹表面会不断出现崩裂、坍塌等诸多问题。如果我们把遗迹回填了,大家又会觉得不真实。您如何看待这种从学术出发的保护理念与公众需求间的展示冲突问题?

徐光冀:其实不光是邳城,中国的绝大部分大遗址、都城遗址都是土遗址,夯土质地不像西方的石材遗迹那么坚固,再加上数百年、千年的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质地就更加脆弱,这个特点我们要先有清醒地认识。有些是可以展示的,有些是不能展示的,重要的是将本体保护好,保住了就是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的贡献。我们现在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使这种土遗址长期保存展示,像半坡遗址、大河村遗址的结果都不理想,不成功我们就要吸取教训,不要走老路,要想新的办法,关键是把它保住。

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地下遗迹仍应以回填保护为主,地面遗迹保护应以物理材料为主,如城墙、台基。遗址展示给公众参观很重要,但是你要让他们看地层关系很复杂的遗迹,效果未必好。在大规模揭露的遗址上建设大面积展厅或者展示棚进行开放展示,温湿度以及因为游客增加导致的二氧化碳浓度,也会对遗址造成破坏。再者,一些过于高大的标志性展示建筑,可能会给遗址的环境带来冲击,以至于喧宾夺主。所以一些重要的遗迹可以进行模拟展示,比如城墙、城门、建筑台基等,这样本体不会受损失,若干年以后模拟的基址模型坏了,还可以再做。所以,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示,能展示就展示,不能展示就保住本体。当然,必要的展示还是要的,有助于公众参观,有利于大家了解文物,加强文物的保护意识。

所以本质上这不是从学术出发的保护理念与公众需求间冲突问题,而是由遗址特性和保护技术决定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展示的同时要考虑保护的可持续性。在保护土遗址时,要尽量运用传统的方法。邳城有三台,最有名的是铜雀台,现在还剩一个角。对它的保护就是培土,培上夯土就形成对文物本体的保护

了,培上的夯土若干年后坏了,还可以再培,这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方法,比如说用化学方法加固夯土,这就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到可逆性,如果不能可逆,就要先找别的地方试验。比如大甸子遗址的彩绘陶,用的方法就是可逆的方法,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还保存得不错。壁画的保护,有些化学方法可以做,有可逆性可以做。夯土的加固,有的用化学方法,表层的若干公分确实非常结实、坚固,但是这若干公分以内它整块剥离,整块地塌了。当然,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要不断地研究、实验,会有一天有办法的,需要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做,但是文物本体绝不能拿来做试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沈丽华:近年来,全国各地不管是因为城乡开发,还是遗址保护利用比如遗址公园建设需求,都使得考古发掘面临工作量陡增、工期紧张但业务人员又严重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考古发掘开展比较粗放,不管是信息的提取还是对遗迹现场的保护都存在一些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处理?

徐光冀:我们的考古工作可分为两种,一类是基本建设中的抢救性发掘,一类是以科学研究为出发点的主动性发掘。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基建中的考古工作的被动工作量增大,而另一种是新形势下的新工作类型,就是为了文物保护的考古工作,所以要区别对待。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来年,我们面临的形势是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城市改造、农村建设、乡镇企业发展,对我们的文物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也有很多的破坏。这是形势严峻的一面,当然也有形势好的一面,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文物事业经费逐年增加,之前财政部每年都有拨专款保护大遗址,后来合并到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的专项经费中,考古经费也在逐年增加,但只是经费的增加显然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专业队伍的扩充,配套政策的出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系统地解决在基建中工作量增大的问题。



图一〇 2012年冬考察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

现在随着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大众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关注、参与考古行业,很多高校的考古院系也开始扩招,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人才队伍会有相当程度的改善。很多地方像南京、成都、郑州近两年政府都先后出台了建设用地先考古再出让的政策,把考古工作前置,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考古工作受建设工程工期“压迫”的情况,所以我相信第一种情况应该会慢慢得到解决。

第二种情况,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考古工作,考古研究的基础工作要做好。比如说配合保护规划的编制,如果做不好基础工作,它的范围不清楚,哪些地方是最重要的,哪些地方是一般的,都不清楚,那就做不好保护规划。所以,最基础的工作,是要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把工作做扎实、做好。首先要确定它的范围和整体布局,它的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这几条线要非常清晰。对于基本建设考古,我们现在的要求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是考古工作配合基本建设,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以后,我们就叫做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这个是要完全按照田野操作规程,按照要求来做。时间上紧一点,那就是说你要多做,冬天做,夏天也做,实际上就是一直做,但是工作还是要保证质量,质量是按照统一的操作规程来验收。当然发掘量比较大,有些地方做得可能要粗放一点,但按要求的讲应该是一样的。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考古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发掘出来的这些遗迹、遗物通过宣传和科普等被公众所了解和熟知,这是考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公众考古开展,希望以各种方式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也能参与到考古这项工作中来,增加他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了解和文化的感受,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媒体正确宣传和引导,把我们国家的这些古代文物讲清楚,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住、感兴趣,并结合一些新的科技手段,例如互联网、三维展示等技术提升公众的兴趣。考古展示给我们的是历史,是真实的东西,这些历史遗迹、遗物是最具有说服力和穿透力的实证,证明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文物保护并不只是一个文物部门的责任,也不是一个考古队的责任,而是地方政府的任务之一,地方政府要作为主体参与进来。现在习总书记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落实了,考核地方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绩效,政府有保护的责任,从国务院到省、市、县,都应当作为主体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这样不管是基建中的抢救性发掘,还是配合文物保护的考古工作,才能真正发挥好应有的



图一— 2014年8月与邳城考古队新老队员于邳城博物馆(左起:何利群、顾智界、徐光冀、赵永洪、朱岩石、朱海仁、沈丽华)

作用(图一〇)。

四、当前考古工作存在问题与展望

沈丽华: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您每年都会检查很多考古工地,从检查情况来看,您觉得当前考古工作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徐光冀:现在的考古工作发展很快,特别是新技术的采用,1986年我们在邳城发掘朱明门遗址时,为了航拍,特意租了热气球,后来还和安阳航校租过飞机,在当时算是开创性的。现在有无无人机,那更是进步多了。每年我都会参加一些省份的年终田野汇报,非常精彩,有很多比较好的照片,但是也有些遗憾,现在很少能看到实测的线图,这是不好的现象。实测线图在考古学研究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照片不能完全取代实测线图。

沈丽华:我看过您在《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2日第7版)上发表的一篇小文章《田野考古摄影二题》,非常敬佩您在文中指出了由您自己主持的《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报告中的一处错误,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学术精神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特别是您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如何对待前人工作的问题。

徐光冀:是的,现在的大遗址,特别是都城遗址,都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工作。我在邳城工作过,到现在那里已经是第三代人了(图一一)。在殷墟,持续几代人进行的工作更多了,那里的工作已经开展90多年了。要有序地培养接班人,一代一代地做下去,才能够做得更好。在这个过程中,后来人一定会比前人获得更多的发现和信

息,这时我们对过去的工作一定要历史地看待,在当时的条件下那样做就是最好的,就可以了,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标准来说以前的事。当然现在已经发现的明显的错误,也要勇于认识,及时纠正。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沈丽华、郭薛: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组织中央政治局常委学习之后,做了很重要的讲话,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也曾经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向建立中国学派的目标攀登”^⑩。您如何看待中国学派这个问题?

徐光冀: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0年9月28日就“我国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进行讲解,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总书记在报告后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性。总书记说:“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自信提供支撑。”同时还提出四点具体要求。这是对中国考古学界提出更高的要求,指明学科的发展方向,鼓励考古学界同仁继续努力奋斗。1981年苏秉琦提出:“在国际范围内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⑪正如你们所说,以后几次提出“中国学派”的问题,我认为是正确的,这代表了中国考古工作者的气派和担当,是符合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的。尽管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有一些不同议论,也是正常的。其实苏秉琦是受了胡绳的启发,1975年胡绳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讲话,讲到社会科学各学科,应建立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苏秉琦受到启发和鼓舞,我也听了胡绳报告,先生听后极为赞同胡绳讲话,与我多次谈论,见诸文章则是较后的事情。

沈丽华、郭薛:除了政府层面还有社会上的考古热和文保热现象,很多高校陆续新设了考古或者文博专业,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考古和文保事业中来,对于正走在成长道路上的年轻学人们,您可以给些好的建议吗?

徐光冀:首先,以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而言,青年时期主要从事以辽西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至秦汉时期的考古工作;中年时期投入到邳城遗址及其陵墓区的考古工作;到了老年时期开始做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这些工作是相互穿插进行,由于不断地工作转换,这在研究上会受一些损失,但首先要服从工作需要,

这使得我必须不间断地重新学习,以弥补在理论方法、知识结构方面的不足。保持努力学习的心态,不要有畏难情绪和逃避心态,同时兴趣是可以在工作中培养的。这是我想和年轻朋友们说的第一点。

第二,考古工作者们要更多地介入文物保护工作,而不是只在基本建设中进行文物保护。文物工作方针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形成的。从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侧重于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和对文物的修缮保养,提出“必须严格恢复原状,或者保存原状的原则”。到1982年通过《文物保护法》,将条例上升到法律层面,规定在文物修缮、保养、迁移中,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就更为明确了。1992年,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方针,再到1995年提出“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最后到2002年修订《文物保护法》,将第四条“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正式纳入国家法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一方针的确立,才使得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工程中对许多考古遗址的保护得以有效的进行。但文物法所能保障的权益目前还只停留在国家组织的大型基本建设,如高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省市一级的建设中文物法还不能有效的落实,仍然存在很多矛盾。不过从中央到地方,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爱民族、爱国家的思想深入,使得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变得不可或缺的,这有利于我们的文化传承、文化自信。

第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家、文物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理念也要发生转变。要更多的培养人才,让他们知道老一辈的经验教训,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善意和鼓励,让更多的青年人投入到两个一百年的建设中去。考古学研究始终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只有众多学者多方面的团结协作,才能取得好的成果。培养人才,要关注他们的成长,要给予他们相应的待遇。

第四,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学风浮躁、急功近利,轻报告、重论文、轻质量、重数量,甚至抄袭等现象,这些都要予以抵制,培养严谨、优良的学风。

沈丽华、郭薛:和您聊天,真是受益良多,衷心地感谢您!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您出生于1935年,属相是猪。1959年您大学毕业、1983年邳城队成立、1995年您离开邳城队、2007年《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编撰正式启动,都是猪年。现在邳城队工作的我和何利群老师都属猪,不过何老师比您小三轮,我比您整整小了四轮,不知道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天意?(笑)最后,再次感谢您陪我们聊了这么久,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恭祝您健康长寿、吉祥如意!

附记:本次访谈的策划和完成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①徐光冀:《废墟上的足迹——徐光冀考古与文物保护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 ②朱岩石:《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徐光冀》,科学出版社,2015年。
- ③朱延平:《废墟上的足迹》,《皓首丹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风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 ⑥黄克忠、徐光冀主编:《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
- ⑦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 ⑧徐光冀主编:《三峡文物保护》,科学出版社,2018年。
- ⑨徐光冀主编:《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献选编——回眸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发掘六十周年》,科学出版社,2020年。

注释:

- ①苏秉琦:《战国秦汉考古》整理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俞伟超1954年从北大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7年回北大攻读研究生,彼时以研究生身份参与教材编写。
- ②安特生著(袁复礼译):《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3年。
- ③濱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紅山後——滿洲國熱河省赤峰紅山後先史遺跡》(東方考古學叢刊甲種第六冊),東亞考古學會,昭和十三年(1938年)。
- ④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 ⑤岸俊男:《日本の官都と中国の都城》,《都城》,社会思想社,1978年。
- ⑥秋山日出雄:《日本の古代都城の原型——鄴京復原再考》,《神女大史学》2,1982年。
- ⑦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 ⑧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三国—宋元考古》,1974年2月油印本。
- ⑨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
- ⑩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⑪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二)》,第28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